

长三角科创大家谈

本报记者 巩持平 于量

香港中文大学(深圳)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郑永年的行程常常排得密不透风。

每隔几天,他公开的活动信息便会更新。3月20日,他出席广东的“十五五”规划专题分享会;3月22日,他在北京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;3月24日,他到海南参加博鳌亚洲论坛;4月初,他又应邀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。

这似乎是他的学术策略之一。郑永年说,自己不是“书呆子式”的学者。他长期从事政策研究,也长期与企业、社会和政府部门打交道。在他看来,政策研究不能只从书本中来,也必须进入真实世界的运行现场。

记者说明来意:想请您谈谈上海(长三角)国际科创中心建设。

他像是稍稍松了一口气。“这个话题好讲。”郑永年说。停顿片刻,他又补了一句:“同时非常重要。”

这两个判断放在一起,起初并不容易理解。对郑永年来说,上海(长三角)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当然是区域发展议题,但又远不止于区域发展。它真正指向的,是中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,如何打破内部壁垒,组织创新资源、形成世界级城市群竞争力的问题。

换句话说,长三角能不能“拧成一股绳”,不只是长三角自己的事。

郑永年:避免“土豆式内卷”

打破内部壁垒、组织创新资源、形成竞争力,不只是长三角的事



3月27日,郑永年(右三)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。



视觉中国 郑永年接受本报采访。 于量摄



“各地政府没有独立思考,看别人做了自己也赶紧做,也不思考有没有条件,有条件下,没有条件也上。科创体系要从封闭转向开放,要形成庞大的科技交换市场和思想交流市场,对内开放甚至比对外开放更重要。”

郑永年是浙江余姚人。虽然这些年主要在珠三角工作,但他一直说,自己是地道的“长三角人”,也一直密切关注长三角的发展。

在他看来,“十五五”相关规划表述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,是“上海国际科创中心”进一步拓展为“上海(长三角)国际科创中心”。

这不是简单的名称延展。“为什么单单把上海放在括号外面?”郑永年问。他给出的解读是,上海仍然是龙头,但这个龙头不能只想着自己。上海是长三角的龙头城市,要有一个“老大哥”的样子。

他更大气、更开放,要把视野打开,也要考虑“兄弟伙”的利益。

但现实情况是,各地发展中“内卷”的情况时不时出现。

那段时间,“Open Claw”是热门科技词语,带动AI智能体爆发,也掀起一波“养龙虾”的热潮。长三角各地政府反应很快,纷纷出台支持政策。有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:“政策就是这两天准备的。”

一个风口出现,各地很快跟进;一个赛道被看好,各类园区、基金、补贴、招商计划迅速上马。热潮来时一哄而上,退潮时又一哄而下。这样的循环,在新能源汽车、低空经济、大模型、算力中心等领域都曾不同程度出现。

郑永年对此有些着急。

在新能源汽车行业,价格战持续升级,企业之间靠低价竞争抢占市场

土豆颗颗分明,土豆茎一断,各自独立,互不关联。土豆和土豆的关系,怎么才能打通?郑永年用土豆来比喻企业之间的关系,比喻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,也比喻实验室之间的关系。

由此,郑永年呼吁“开放”,“对内开放甚至比对外开放更重要”,他认为。

这句话听上去有些反常识。人们谈起开放,通常首先想到的是面向国际市场,吸引外资、扩大贸易。但在郑永年看来,进入新发展阶段后,中国内部市场、内部区域、内部制度之间的开放同样关键,甚至更加迫切。

因为中国市场足够大、产业体系足够完整、创新资源足够丰富,如果内部壁垒不能打通,就会形成巨大的制度性损耗。反过来,如果内部要素能够充分流动,区域之间能够合理分工,中国自身就可以形成一个庞大的创新循环和科技交换市场。

“开放的好处,在于形成合理的劳动分工。”郑永年说,不同城市、不同机构、不同企业,应当在更大的区域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。

但这需要协调机构,也需要制度创新。“要把阻隔开放的东西都清除掉。”他说。而上海(长三角)国际科创中心建设,恰恰需要这样的制度能力,真正形成跨区域的分工和资源分配机制。

中国的成功不能叫弯道超车

“近代以来,不经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大规模工业化的经济,还能成为一个经济强国的,才叫弯道超车,我们没有弯道超车,从农业化一路走到工业化,只是我们比人家走得快。”

在郑永年看来,理解今天中国为什么必须强化科技创新,还要回到中国现代化的路径本身。

在他的划分中,中国经济前几十年的发展,很大程度上依靠西方成熟技术的引进、学习、消化和应用。更直接一点说,其中包含了大量“山寨版”阶段。经过几十年的技术积累,中国企业和市场逐渐开始出现原始创新能力。

到今天,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发展的最大动力和源泉。

有一种说法,叫“中等收入陷阱”,指国家经济增长停滞、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区间,而无法进入高收入行列。郑永年更强调另一个问题:中等技术陷阱。

一个经济体如何把自己提升成为发达经济体?能源丰富的小经济体,可能因为能源价格上涨而致富;小型经济体,也可能依靠某个单一产业站上高收入水平。但对中国这样体量巨大的经济体来说,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,才能走得稳、走得远。

换句话说,中国要跨越的不仅是收入水平的门槛,更是技术能力的门槛。

为了跨越“中等技术陷阱”,郑永年提出科技创新的“三驾马车”:基础科研、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赋能。

这三个环节看似常见,但在现实中并不总能顺畅衔接。

先看基础科研。郑永年认为,中国近年来在科研投入、论文数量、专利申请和重大科研平台建设上取得了显著进展。但“数量多”并不等于“能力强”。基础科研最需要长期主义、稳定投入和自由探索。如果过早要求基础研究必须立刻产业化,反而可能伤害其原创性。

再看技术转化。郑永年观察到,一些部门鼓励做基础科研的人直接去做成果转化,还要筹钱、办企业、找市场,这种“全才”理论上不是没有,但现实中

成功案例很少。成熟的创新体系,应当允许不同角色各司其职:科学家专注发现,工程师完成验证,企业家组织产业化,资本承担风险定价,政府提供制度和公共平台。

最后是金融服务。科技创新具有高风险、长周期、不确定性强的特点,尤其在硬科技、生物医药、集成电路等领域,从实验室成果到商业化落地,往往需要多年投入。没有耐心资本、风险投资、产业基金和资本市场支持,许多技术很难走完“死亡之谷”。

因此,上海(长三角)国际科创中心要真正建成,不能只是多设实验室、多引人才、多挂牌子,而要打通“基础研究—技术转化—产业落地—金融支持”的完整链条。

“下一步,我们国家的发展会越来越快,有望实现全面超越。”郑永年说。

采访快结束时,郑永年又回到那个最初的问题:上海(长三角)国际科创中心为什么重要?

答案其实已经藏在他一连串比喻里。

实验室之间的墙应当拆掉,地方政府之间不能总是“土豆和土豆”的关系,城市群内部也不能在同一条赛道上彼此消耗。中国要拉动“三驾马车”跨越“中等技术陷阱”,要在中美竞争中赢得主动,就必须把分散的创新资源组织成系统能力。

长三角的使命,不是多建几个园区、多抢几个项目、多追几轮风口,而是回答一个更大的问题:中国能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形成一个足以吸引全球人才、承载原创技术、孵化未来产业的世界级创新生态?

郑永年说,这个话题“好讲”。真正难的,是把它做成。

电视节目预告表,包含日期、频道、节目名称、播出时间。

东方影视频道节目表,包含日期、节目名称、播出时间。

中超联赛第7轮节目表,包含日期、比赛对阵、播出时间。

剧场:沉默的荣耀节目表,包含日期、节目名称、播出时间。

中国民歌盛典节目表,包含日期、节目名称、播出时间。

长三角地区企业破产清算公告,包含企业名称、破产原因、管理人信息。

长三角地区企业破产清算公告,包含企业名称、破产原因、管理人信息。

长三角地区企业破产清算公告,包含企业名称、破产原因、管理人信息。

长三角地区企业破产清算公告,包含企业名称、破产原因、管理人信息。

长三角地区企业破产清算公告,包含企业名称、破产原因、管理人信息。

长三角地区企业破产清算公告,包含企业名称、破产原因、管理人信息。



扫码看视频